

中國現代哲學史

資料汇編



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

“第三条道路”批判

主 编 钟离蒙 杨凤麟

一九八二年五月 沈阳

目 录

把“民主个人主义者”引导到革命斗争道路上来	林伯渠 (1)
如何跟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陈毅 (2)
白皮书说明了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吴玉章 (4)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 (节录)	郭沫若 (5)
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郭沫若 (8)
“理未易明”么?	胡绳 (13)
国家是谁的?	胡绳 (14)
百年来的中国革命	胡绳 (19)
孙中山从美国走到苏联	胡绳 (25)
谈民主须能认识人民的力量	梓年 (潘梓年) (28)
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	马叙伦 (31)
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	陈垣 (34)
第三方面的新生	石父 (林石父) (36)
第三方面错在哪里?	辛璜 (39)
论中间派及中间路线	何文俊 (41)
论“中间路线”	陆一远 (45)
论“第三方面”	公孙求之 (47)
关于“中间派政治路线”以外的话	苏平 (50)
有没有一条“中道”?	纯青 (55)
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杜迈之 (57)
再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杜迈之 (62)
伪自由主义者的真面目	伯奇 (67)
自由主义、判批、批判的态度	伯奇 (71)
总结关于“自由主义”的论争	庞欣 (74)
驳《大公报》	陈伯达 (80)
质中共	《大公报》社论 (90)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大公报》社评 (92)
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	天津《大公报》社评 (95)
政党·和平·填土工作 (摘录)	《大公报》社评 (96)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胡适 (98)
自由主义	胡适 (100)
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	胡适 (103)
延安归来	梁漱溟讲 左灼记 (111)
论中国的出路	张申府 (114)

再论知识分子.....	张申府 (121)
《立国之道》新版序.....	张君劢 (124)
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	张君劢讲 更生记 (127)
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	张君劢 (146)
中国之将来——在科学研究.....	张君劢 (149)
中国之过去与将来.....	张东荪 (153)
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	张东荪 (175)
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	张东荪 (178)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补义.....	张东荪 (182)
中立、调合与中间派.....	施复亮 (192)
中间派的政治路线.....	施复亮 (194)
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	施复亮 (199)
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	施复亮 (203)
论自由主义者道路.....	施复亮 (208)
中国需要第五个大政党.....	罗隆基 (212)
读“自由主义宣言”.....	潘光旦 (216)
政治必须主义吗?.....	潘光旦 (222)
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 (225)
自由主义与文艺.....	朱光潜 (227)
自由主义与学术.....	贺麟 (229)

把“民主个人主义者”引导到革命斗争道路上来

(林伯渠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白皮书会上讲话的结束语摘要)

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假北京饭店座谈美帝发表之白皮书问题，已志昨报。林伯渠同志在座谈会的结束语中，号召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特别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教育那些对美帝存有幻想的人们的重要意义。以下是林伯渠同志结束语的摘要：

林伯渠同志首先说：“这个会开得很好。美帝国主义在白皮书中，赤裸裸地暴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事实，同时无可奈何地招供了援蒋的失败和承认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事实。但它不会甘心，它又搬出‘民主的个人主义’这块涂着美国商标的招牌来，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胜利。因此，我们必须教育人民，教育一切不能清楚分别问题的人们，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伯渠同志特别提起大家注意：“要把问题弄清楚，基本的一点是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分析帝国主义的一切特征，从根本上了解其对内对外所必然采取的反动反革命和侵略的政策。因此，我提议我们应当好好地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大大地宣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使大家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和为什么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其次，还要具体地研究美帝国主义，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们当前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我建议我们还可以看看‘美国一千人’这类小册子。‘美国一千人’的作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它供给了不少的具体事实可作研究美帝国主义的参考。”关于“民主的个人主义”，伯渠同志说：“所谓民主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存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些人的经济地位是软弱的，在政治上是动摇的，其中一部分人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和恐惧，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性所限制和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等影响所决定的。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除了提高自己之外，还有责任帮助他们进步。白皮书在艾奇逊的眼里，自然是对‘民主的个人主义’分子的一张最好的招生广告，是用来‘鼓励’他们去投效，去求得‘发展’的。但在中国人民看来，白皮书只是美帝国主义在招认罪状之时企图把那些对美国还有幻想的分子拉去作殉葬者罢了。我们这里很多所谓‘民主的个人主义’者是有爱国心的。艾奇逊的手法丢了这些人的脸，浇了他们一瓢冷水，把这些人们对美国的幻想推上了幻灭的道路。和艾奇逊相反，我们是把这些人引导到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来，首先把他们和敌人区别开来。我们对他们是老老实实的说服，是根据事实，鞠诚以告，是严肃的与人为善的适当批评。利用白皮书，叫他们也认清美帝国主义，团结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之中，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八、二八，第一版)

- 1 -

如何跟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陈毅市长在上海高教联暑期学习会
总结会上讲话志要)

各位先生：

上海市各大专学校教职员暑期学习会今天结束。会期中曾有市府及高教处同志参加学习，发表意见，希望大家讨论研究。本人本应来跟大家共同学习，因时间太少，未能如愿。有一次高教联邀我演讲某一个问题，又因为台风袭沪，忙于救灾，没有参加，深感抱歉。希望此后仍有这样大规模的集会，让我们听取大家的意见。

解放后我感觉我们说话太多，而各界朋友说话太少，少数人考虑问题决不能有多数人考虑的周到。因此以后各重大问题的决定，均要用民主的方式，由多数人来共同决定。前几天各界代表会议的意义就在此。但这尚只是初步，而且用邀请方式总难免遗漏。希望各人民团体尽速筹备成立，能由各界人民推出自己的代表便可避免邀请方式的遗漏，至于将来过渡正式的人民代表会议，由人民代表会议来选举政府的委员和市长，这样便能更进一步使政府与人民打成一片，造成完整的人民民主制度。共产党人说的领导，即是要虚心请教，先向大众学习，收集人民意见，集中人民意见，再付诸实施，是这样来取得领导地位。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先做学生才能做先生，所以领导与独裁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上海解放后，我们承认做了许多巨大的工作，当然也免不了有错误和缺点，因此，我们必须用代表会的方式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归纳起来成为施政纲领。这自然比片面决定要好得多，此后各界代表会的代表产生一面仍要用邀请方式，一面也尽可能由各人民革命团体内部推选，就会照顾得比较周到，在这里就希望各人民团体能按照民主原则把自己的组织健全起来，真正能表现人民的意志，有了这样的民主基础，与政府结合或直接推选政府人员，这样就能进一步实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把人民民主专政发挥到最高限度——就是说对人民是民主的而对反动派施行强力的专政。

大家服务高等教育已经多年，学有专长，仍旧这样虚心学习，这就是民主精神的表现，事实上民主就存在于简单的日常生活里。必须把民主精神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革命的人民已解放的人民各自按自觉自愿的民主原则把自己组织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我们不希望大家隐忍不言，也不愿听取唯唯否否式的意见，我们很喜欢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善意的批评。暑期学习会上各同志所作的报告，如果是对的，大家可以拿来作参考，照着去做，如果是不对的，应该起来纠正，或提出不同的意见。大家对我们这样虚心，我们也应该对大家虚心请教，今天我对大家热心学习的精神深表钦佩，并致革命的敬礼。

其次，我愿提出一个问题来跟大家共同学习，那就是最近美国国务卿所发表的一本白皮书。解放日报连续登载了几个文件和社论，也就是要大家来研究白皮书，尤其是高教同仁，有责任来加以研究，把正确的意见传达给社会的各阶层。这问题我愿提出三点意见来供大

家讨论：

(一) 美国帝国主义的白皮书的内容如何

有人对白皮书作过统计，说它有一〇五四页，重达十二磅半，总结中美关系自鸦片战争后四年（一八四四年）的南京五口通商条约起至南京上海解放止，共一百零五年。这样百年流水大账如不加以一读，未免有点辜负艾奇逊先生的辛苦。

这一〇五四页主要内容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份说明日本投降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曾提出三个方针来选择：①完全退出中国。②用武装援助国民党，彻底消灭中共。③用金钱和武装援助国民党建立威权使国共协商来限制中国人民力量的发展。

第二部份说明计划的实施。第一个方针，因为美国自认是世界领导者是不能也不应该退出中国的，这就是充分暴露了美帝攫夺世界霸权和以中国保护者自居的狰狞面目。第二个方针会遭到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反对，只好采用第三个方针，这里太不老实。很明显美帝国主义是将第二方针与第三方针同时采用，就是干脆命令蒋介石采取发动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方针。但他说因为国民党内部腐败，惨遭失败，无论美国已经作的，能够作的或准备作的都不能挽救。

第三部份说明美帝最后的野心和希望，美帝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于是想在中国人民胜利的阵营中找出所谓“个人民主主义”把他们组织起来，继续捣乱中国，恢复美帝的统治。

美帝这种心情，正可拿两句熟习的古词“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来说明。怀念他过去百年来在中国似花盛开的威权，可是而今，在人民解放军的劲风下零落了。梦想“个人民主主义”的燕子和春天归来，与他重温旧梦，恢复帝国主义的统治。自然我肯定说帝国主义的鲜花不仅在中国已零落不可能再开，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面临凋残的境地。至于春天呢？我们又肯定说：春天是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不会再有他的春天，帝国主义盼望着燕归来也会绝望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在中国有否“旧燕子”个人的民主主义去依附他？

(二) 在解放后的中国，白皮书有没有它的社会基础？

白皮书里所希望的“个人民主主义份子”如果认为在新中国里已无存在，这是幼稚天真的看法，使我们在美帝面前解除武装和警惕，如果认为这“个人民主主义”在新中国有一大部份，那也是没有对问题观察清楚，表现出过份估计，问题不是在有没有，而是在我们要针对这阴谋，加强我们的警惕，团结起来，用思想斗争，集体学习的办法，使某些动摇份子不致于上美帝的钓钩。

一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与封建势力勾结，造成一系列的半殖民地与封建的制度和习惯，也就造成了适应帝国主义需要的一定的社会基础。这一基础不是解放后几天内能够扫除的，必须多年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因此美帝白皮书所说的“个人民主主义”是有其一层薄薄的基础的，尤其是我们采取了宽大的政策，这种份子更能保留下来自解放的领域之内。

中国共产党，历年来严格执行整风运动，和整党运动，就是早有预见，在组织上，思想上进行消毒，使帝国主义的毒素不能渗入。各人民团体，都要采用我党这经验严整自己的阵容。

帝国主义是惯用他们的各种武器，因此我们也要善于利用我们的各种武器来进行斗争。辛亥革命时帝国主义者看见满清不行了，孙中山太左就选择了袁世凯，把帝国主义的统治延

长了十六年，在北伐战争里又丢弃了孙传芳等军阀，而分化革命阵营，因而选择了蒋介石作工具，阻止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权，把帝国主义的统治又延长了好多年，今天他又想从革命阵营里进行分化工作，寻找新的工具，但是今天的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之下，这些伎俩是行不通了。

（三）如何跟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美帝的白皮书，是一个政治号召，与此相呼应，在经济上实行有机的配合，就是经济封锁。因此对美帝的白皮书的斗争，一面是思想意识的斗争，同时必须与反对封锁和坚决执行六大任务，联系起来，有力的答复它，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则打破封锁，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在蒋介石廿余年的统治里，他的统一是可怜的，除了苏浙皖赣湘鄂豫几省外，其余各省都在军阀割据中，而今日面临全国解放，靠中国统一的广大面积，自力更生，改换生产方向，用全国的力量来援助上海，用上海的力量来配合全国，封锁的困难是不难打破的。

总之，美帝在政治上的挑拨手段，我们可以用严整思想的阵营来打破，在经济上的封锁，则用全国自力更生来解决，我们敢说，美帝的白皮书新阴谋其篇幅虽长，我们加以揭破，其必然失败是无疑义的。

（原载《解放日报》，一九四九、八、廿一日、第一、二版）

白皮书说明了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 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吴 玉 章

白皮书是美帝侵略中国的一篇黑账。在它列举自己的罪行的时候，同时也说明了一个真理——阶级斗争的真理：人民和反动派中间不可能有任何妥协，更谈不到什么友谊，只有和反动派坚决顽强的斗争，把它们打倒才能获得解放。在斗争的过程中世界人民和各国反动派必然会分成两个鲜明敌对的阵营。所以对于封建残余或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都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白皮书不客气地把蒋介石反动集团骂了一顿，怪它们不争气。可是，骂尽管骂，不争气尽管不争气，支持还是要支持的。并且如果不是害怕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和美国人民的不同意，据说还要想对中国大规模军事干涉，还想把东北“共管”。这说明了中国反动派没有帝国主义撑腰固然不能维持统治，而帝国主义也必须通过反动派才好放手侵略。消灭了反动派也就消灭了帝国主义的支柱。因为他们是一个阵营里面的。至于美国人民，我们是要把他们和帝国主义者区别开来。帝国主义者的行为不代表美国人民的意志，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对美国人民的看法应用到帝国主义者身上去。

艾奇逊叫嚣着要反对“中国建立起任何服役于外国利益的政权”，要反对“在外国公开或秘密影响下，使中国支离破碎”。在中国服役于外国利益的政权有一个，就是已被人民打

垮了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企图支持中国各地反动势力而使中国支离破碎的不是别人，就是美帝国主义。白皮书虽然尽一切可能污蔑和挑拨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友谊，可是中国人民很明白，把飞机、大炮搬到中国来屠杀人民的正是美帝国主义，不是苏联。即使马歇尔、艾奇逊之流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我们并不否认我们是站在苏联一边的，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是同属于人民阵营，正如各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势力是同属于反人民阵营一样。

美帝援蒋是彻底破产了，于是寄幻想于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中国人不管怎样，甘心当美国第五纵队的到底不多。不过我们必须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从阶级斗争观点去看问题，今天在人民与反人民阵营之间绝对没有第三条路。不然，老要觉得自己不偏不倚世界上顶公正，想站在超阶级的立场，而不站在一个革命的正确的阶级立场去看事情，就很不容易把事情搞清楚，因此也就容易上当。

（原载《人民日报》，一九四九、八、卅日，第一版）

历史的路只有一条（节录）

郭沫若

（二）

因为偶然的凑巧，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在议事堂中反政府的急进党派坐在左翼，拥护政府的温和党派坐在右翼，从此相沿成习，举凡积极进取的主张或派别便被称为“左”，消极保守者被称为“右”，因而也就有不积极不消极亦进取亦保守的中间派出现。

这左中右的意义不用说就是前中后或急中缓的别名，它们是在带有箭头的一条直线上，而不是在一个发足点的横线上的三个带箭头的平行线。这本来是常识问题，然而今天有好些脱掉了常识的人，竟认真把它们当成左边，中间，右边在讲了。因此，在我们中国竟有人创造出了所谓“中间路线”那种根本不通的名词，还在那儿大发议论。最近又看见了有所谓“两极化”的妙论（见香港“大公报”3月16日的社评），是说世界的趋势左的要左到极端，代表是苏联，右的要右到极端，代表是美国。他们要走“中间偏左”的道路，似乎是以英国为模范。我说这议论妙，因为那位“一个焦焚之心无处安放”的执笔者竟公然找到了“中间偏左”的生理学上的科学证据。“人心本是中间偏左的，谁的心不长在中间偏左的位置？但在两极化的现世界中，强有力者偏偏忽视了甚至敌视了这条正确路线。”看了，真不免令人喷饭。这样的妙论，难道是常识正常者所能下笔的吗？

是的，心脏地位是“中间偏左”，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在生理上有一种人，一切五腑六脏的位置完全相反，因之，心脏在那种人的胸中却又是“中间偏右”了。心脏在今天的生理学上已经被阐明了它只是循环系统里面的一个重要机构，它不是如象旧时所认定的思想或精神的主宰，所以即使大体的人心本是“中间偏左”，这又何有于你们所谓“正确

路线”的“中间偏左”呢？

真是太笑话了！把左中右照着字面上的位置来解释，已经是笑话，再来掉弄一点科学知识，弄得来可以使初中学生都会笑脱牙齿。而这位大手笔公然在那儿大喊其“理性”，并差不多天天在那儿喊，真是令人怀疑，他们的“理性”究竟是什么程度的“理性”。

悲哀的倒是有话不好直说，要转弯抹角地摆些迷魂阵，而使自己却掉在阵里。分明是反苏，却把美国拉来陪衬一下作为两反。分明要亲美，却把苏联拉来陪衬一下，作为两骂。但一边的骂是真情，一边的骂是卖俏，你怕读者不知道吗？——不，他正是要你读者知道！你看他的这一套啦！

“最近由于捷克政变的演出，紧接着又有斯大林照会芬兰要求缔结苏芬军事互助友好条约的发表，于是又惹起一片神经紧张。先有美英法联盟宣言的发表，英法荷比卢五国紧接着要缔结军事及经济的西欧联盟，马歇尔的五十三亿援欧方案，最近也已经美参院通过了。”

（3月16日）

“晴天霹雳的捷克政变发生了，接着芬兰的独立自由也遇到威胁了，捷克和芬兰是自由民主的国家，是肯努力于自力更生的民族的模范，他们的受压迫与屈膝是不能不叫西欧中立的国家寒心的，因此原无成立希望的西欧联盟居然宣告时机成熟。”（3月17日）

到底是鸡生鸡蛋，还是鸡蛋生鸡，我们都可以不必过问；捷克的政变是捷克人民的自行整肃，而他竟把责任干脆的推给苏联；苏联向芬兰作缔盟的提议是对等的要求，并且事情还在酝酿中，而他比芬兰的反动派还要着急，伤心，竟喊着“独立自由也遇到威胁”：于是更综合而为捷克与芬兰的“受压迫与屈膝”。这就是标榜大公至正者的所谓“中立偏左”的议论！反正是号召全中国全人类反苏反共的，干脆就反苏反共好了，何必要来这一套的上下其手？假使说玩玩那样的花头，便可以迷惑一些已经清醒了的人民，可惜今天的人民是太清醒了！逼得一些“书生”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说：“我们要走花旗路线”，而只好弯弯曲曲地创造出一些代名词，什么中间路线呀！什么中间偏左路线呀！更是什么自由主义的路线呀，魔笛尽管吹，可惜没有好几个自由主义者跟着跳。这，毕竟是时代的悲剧吧！

（三）

历史是进化的，民主政治的内函也随着历史的进化而进化。

英美等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当他们才从中世纪的封建主权和教权变出来的时候，他们是曾经争取得大多数人的自由。但等他们的资本集中到少数独占资本家的手里，因而便形成了寡头专政，对内牺牲了多数人民的自由，对外牺牲了多数民族的独立。资本主义民主的时代是已经落后了，走在他们前头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苏联。

今天任何保留的理论家都是承认着这个事实的，当然他们不高兴用“前进”这种字样，或者说为“左”或者说为“过激”，那倒无可无不可。至少他们是承认着，苏联是有了经济的平等，便是说苏联已经没有资本家和地主的剥削阶级存在，人吃人的制度是废除了。但他们死不承认苏联有政治的民主。他们有的人在这样说：“希望苏联能够学习一点政治的民主，希望美国能够学习一点经济的民主。”今天又换了一个说法了。便是“在左的方面加上些人文化，右的方面加上些社会化。”这些人都在自以为聪明或公正，其实他们的聪明和公正毕竟是太可怜的。

他们都是一些唯名论者。说民主吧，便死含着一个英美政治形态，以为至少非两大政党

对立不足以说民主。说政党吧，更不管你是苏联的共产党也好，希特勒德国的国社党也好，英国的保守党工党也好，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也好，总是都是政党。他们看到希特勒德国的国社党一党专政，苏联的共产党也是一党专政，德国的希特勒是个人独裁，苏联的斯大林也类似个人独裁，德国在前既是极权国，警察国，所以苏联今天也就是极权国，警察国了。这也就是苏联没有政治民主的基本根据，真是可怜得很，这犹如说，直立猿人是人，文明人也是人，今天的文明人和直立猿人是一样。

事实上是苏联的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他是从人民中严选出来的最能够吃苦耐劳或最忠诚的人民的勤务员。要当一个共产党员是不容易的，当了之后要遵守铁的纪律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苏联的共产党执政，事实上是真正意义的人民亲政，更何况苏联的公务人员有大多数的百分比是非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事实，是不容我们歪曲的。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真实意义的人民领袖。这位领袖不是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而是受人民爱戴尽瘁鞠躬，这也是事实，是不容许我们歪曲的。

问题的关键是要获得人民的意识。假使站在人民的观点上，象苏联那样，人民获得经济平等的国家，岂有没有政治的民主的？假使站在人民的观点上，象美国那样，贫富有天渊的差别，全国的财富集中到八大财阀集团的手里，人民没有获得经济的平等，又那能有真正的政治的民主？对于事物不从发展上去看，不从本质上去看，更不从人民的观点去看，拘泥着一些名词和形象，当然得不到正确的了解。而狡黠者便在这里又可以卖弄他的“聪明”而上下其手了。

然而戏法尽管怎样变，可以骗取得一些本来糊涂的人，骗不了已经清醒了的老百姓。难道你能把苏联的老百姓煽动起来革斯大林的命吗？我就看你，难道你能把美国的老百姓煽动的起来，跟着杜鲁门去打苏联吗？

(四)

“同意革命” (Revolution by Consent) 吗？我们也能“同意”，但要问“革命”的对象同不同意。

今天无可讳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是要经过一道革命的。苏联在他本国内是把这一关已经过去了，问题是在美国。罗斯福在世的当时，他的确是有“同意革命”的用意的。对内施行新政，想借此来不流血地渡过一道革命关。对外赞同联合国，与苏联协和，用以免掉第三次大战的危险，苏联在这一着上也是“同意”了的。然而不幸的是罗斯福死得太早了。罗斯福一死，继承者无法抵抗财阀与军阀的联合攻势，于是废弃新政，拆毁联合国，拿着原子弹和金元作狂热的叫嚣：战争！战争！战争！事情比火还要明白，并不是别人要流血，而是美国反动派要流血。美国反动派那样叫嚣，你怕他们真是在以苏联为敌吗？不，他们是在以人民为敌，在以美国人民为敌！他们那样叫嚣的结果，并打不倒苏联，而只把美国人民叫嚣起来打倒他们自己！

好心肠往往是无补于事的。尽管你就同意不要阶级斗争，然而相对的阶级偏偏不同意，一定要和你斗争。美国的事情我们可以暂且搁下，就把我们中国拿来做个例证吧。前年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不是大家都同意“以政治方式来解决政治的纠纷”吗？然而会议刚一结束，接连就用叫嚣、打扑、捣毁，来把一切决议撕毁了的，接着，依仗着外国的大力，竟不惜掀起了大规模的内战？

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当时，的确是有过“同意革命”的希望。当时有些好心肠的朋友也曾衷心为我们庆祝过。然而那样的局势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错，人类是有“理性”的，他知道同意革命不失为革命的一种方式，但到不能够“同意”以获得革命时他却不能够抛弃革命：这正是“理性”的光辉在辉煌的照耀着。“理性”本是革命的产物，人类的自意识在不断的革命当中产生着进步的“理性”。因为没有革命性的人根本没有谈“理性”的资格！休矣，“祥和”的伪善者！休矣，“一个焦焚之心无处安放”的假“书生”！

（原载《国讯》四五六期，一九四八、四、二）

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

郭沫若

近几年来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项大事件。这运动还方兴未艾，还没有达到它应该到达的目标，从事这运动的人和团体，有好些都还没有到可以充分公开的程度，因此要来回顾这个运动的整个的历史的发展，今天还不是时候。不过关于这个运动的历史，我们是应该注意它的，或许已经有朋友在搜集史料吧？运动的范围既相当广，参加的人物非常多，而时间也相当长远，假使没有人趁早搜集史料，将来恐怕会要丧失的。最好能够有一个组织，先依地域上收集材料：如重庆、成都、昆明、上海、北平、西安、香港等地，都应该有人负专责来从事进行。假使在中国的民主化走上轨道的一天，便能有一部完整的“民主运动史”问世，那实在是值得双倍喜庆的事。

说来差不多有点像神话一样了。中国虽然号称为“中华民国”，然而有一个时期连“民主”与“人民”这样的字面都成为了犯禁的东西，远的且不说，就在抗战初期，由南京迁到武汉，由武汉又迁到重庆的那最初的三四年，各地的报章杂志上普遍地是看不出“民主”与“人民”这样的字眼的。起初是天天听见“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三位一体的口号，继后便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新三三位一体。字面虽然变了，内容根本无别。朕即国家，朕即民族，故朕即至上，此“一个领袖”也。意志集中于我不容“分歧”，此“一个主义”也。力量集中于我，不容“割据”，此“一个政府”也。似乎多了军事胜利的一项，然而此乃对内的军事胜利，非对外的军事胜利也。“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者朕之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者朕之用耳。三位一体，归之于朕。如此而已。

“民主”的字面，是什么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由什么人的手里，大胆地在近几年内又重新出现了的，差不多是值得考古学家来从事发掘的问题了。拿我自己来说，我在二十六

原注：“国讯”是职教社的机关刊物，也可以视是民主同盟的机关刊物之一。“通讯”只创刊于1931年12月23日，原名“救国通讯”后改为今名。曾经两度停刊，两度复刊，有过上海版、重庆版和香港版。于1948年4月9日（458期）停刊。该刊发行人是黄炎培，主编人是俞頊华、杨卫玉。——编者。

年的十月九日替当时上海的新闻报写过一篇短文，题名叫“情力与革命”，是为纪念双十国庆而写的。在那短文里面，我在尾巴上裁了这么两句：“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建立民主政治的革命精神！促进我们的对于专制情力的扫荡！”在当时，老卖说，连我自己都有点感觉着不合时宜的。在当时大家的目标是在争取抗战，只要抗战了，就不民主一点似乎都可以容忍。这样容忍一下，积习既久，于是“民主”字面便等于进了坟墓。久而久之，连“人民”也不敢说了。在三十一年的二月，我把信陵君与如姬的故事写成了一部史剧，叫“虎符”，因为写的是历史的东西，我在里面使用了些赵国的“人民”，魏国的“人民”这样的字句。然而在第二年要上演的时候，剧本还须得送审，被审查老爷们把所有的“人民”字面都用硃笔改成了“国民”。“国民”本来是现代的新名词，而且说不定是由日本人开始用起的，竟出现于两千多年前的信陵君和如姬的口里，我自己实在是感觉着有点啼笑皆非的。顺便带说一下，也是那一次的审查老爷们留下的噱头，他们把我剧本中的“舞台左翼”，“舞台右翼”的字面，都改成了“左边”“右边”。幸好他们还很客气，没有率性把“左”字都勾掉。

然而民主运动终于发动起来了。主要是在苏德战争发动以后，世界成了民主与法西斯的两个阵营的对立，国外来的大浪助长了国内的潮流，并帮着冲开了些反动的压力，于是才渐渐有“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字面公开出现。前几年，就如秃头的人忌讳人说电灯泡一样“法西斯”的字面也是禁止公开使用的。夏衍先生有一个剧本叫“法西斯细菌”，竟连名目也通不过，这是三十二年的事。更有趣的是，我的剧本“高渐离”，因为没有恭维秦始皇，也遭了禁止，这也是三十二年的事。这样的事情，会有人以为不像神话吗？然而这神话时代，我也知道是还没有过去的。秦始皇和法西斯依然是今天的电灯泡，而“民主”，却早有冒牌的假货出现了。

民主运动的潮流怕是发源于香港，其次波及到昆明，又其次才到重庆成都，而泛滥到了全国。（我这个溯源或许不大正确。）民主同盟起的作用是很浩大的，但因我没有参加民盟，因而关于民盟的历史我不能够有详细的叙述。我自己所参加的只是重庆的一个局部运动，其它各地方的情形，我都知道得不大详细，就连重庆的一段，认真说，我也有点模糊了。这是由于近年的变化和事件太多，一年的光阴差不多要抵上平静时代的十年百年的岁月。一个大脑表皮耙满了重重叠叠的招贴，实在是不容易耙梳了。这也就是我希望有一个组织来从事编纂的重要原因，假使再不搞，大家恐怕更要模糊吧。在重庆的一段，我本来是有日记的，但那日记还丢在重庆，没有带来，因此我在目前也只能凭着一些模糊的记忆了。

在重庆，就到了三十三年，民主运动都还没有十分开展。那时候差不多的集会都是禁止着，即使有集会，要想当众畅所欲言，差不多都有生命的危险。这时还是一个伏流期，座谈会相当多，但都局限在书斋或会客室里。公开的集会值得提起的只有七月一日在银社的“邹韬奋先生追悼大会”和十一月七日在青年馆的“苏联十月革命第二十七周年庆祝大会”吧。这两个会之得到开成，前者因为是追悼性质，后者因为是有国际关系的原故。在这两个会上情绪都异常悲壮而热烈。我在这两个会上都说了话，把大寇的闷气着实透出了一些，但到第二年二月苏联红军纪念节上本拟定再要我说话时却遭了无形的禁制。而追悼会性质的东西，在韬奋先生之后，再要为杜重远先生举行时，结果是流产了。

三十三年是中国战局愈悲惨的一年，日本人企图打通大陆的交通线以拯救自己的危机，发动了中原大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广西，在十一月的初头更几乎窜扰到贵阳。当时的重庆完全震动了，甚至有迁都西康或兰州的预定。文化界的朋友们也在准备着上山或作逃难的准备了。在这时候民主运动才稍稍显出头来，成为了半公开性质的东西。

在我自己很值得记述的是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夜会。那会本来是为欢迎柳亚子先生而设的，亚子先生刚从桂林逃难来渝，大家为他洗尘，设座于天官府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内。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我自己的寓所便住在四号。当晚差不多所有的民主人士都到了，最使人喜出望外的是周恩来先生恰在那天从延安飞来，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因此，这“双十一”成为了我们朋侪中的一个难忘的日子。沈衡山先生有一首诗纪念这件事体，我要把它抄在下边。喜幸得很，衡山先生手写的一张小条幅我是随身带来了。

“经年不放酒杯宽，雾压江城夜正寒。

有客喜从天上至，感时惊向城中看。

新阳共举葡萄盏，触角长惭獬豸冠。

痛哭狂欢俱未足，河山杂蕴试凭栏。

十一月十一日晚，饮沫若先生家。既逾二十日，乘行舆下神仙口，望见南山，忽忆其事。得句，因成一律。

十二月二日记。”

这首的头二句把当年的时局和大家的心境含蕴得非常稳切，大家愁眉不展甚至焦头烂额地熬了多年，谁还有心情举酒呢？何况冷酷的环境还那么重压着！但那晚上大家实在是尽了兴，又“痛哭”，又“狂欢”，而且还跳了秧歌舞。秧歌舞之到重庆，就是随着恩来飞来的这时在年青的朋友读起来，或许不大能够领会，有些句子是须得加注解的。像“感时惊向城中看”，那是由骆宾王“讨武则天檄”的最后一句“请看今日之域中毕竟谁家之天下”脱化出来的，当时的“域中”自然还是敌伪的“天下”呵。“新阳”，衡老说是指我，因为我的“女神之再生”里面有迎接新鲜的太阳那么的句子。“獬豸冠”是衡老自己说他在做律师。亚子先生和我，对这诗都曾经和音，亚子先生的诗我不记得了，我的一首现在也不妨录在下边。

“顿觉蜗庐海样宽，松苍柏翠傲冬寒。

诗盟南社珠盘在，澜挽横流砥柱看。

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

光明今夕天官府，听罢秧歌醉拍栏。”

当晚同席的有王若飞兄和他的舅父黄齐生先生，他们两位不幸在今年四月八日飞赴延安时，因飞机失事而同时遇难。这不消说是民主运动上的很大的损失，因为在重庆的民主运动，若飞是主要的推动者之一人。但我在这儿提起的是黄齐老也纪念着“双十一”的夜宴，他有一首“沁园春词”可以作为证据。

齐老在参加双十一夜宴后，不久便到延安去了，其后以今年三月又由延安来重庆，特别代表着延安各界来慰劳二月十日较场口事件中的各位受伤者。事毕返延，于其离渝之前二日的四月六日还到我天官府四号的寓所来辞行，那时他为我写出了他那首词，是为“和亚子”而作。

“是有天缘，握手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贬嬉笑，祇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

这儿的“郭舍联欢”说的就是“双十一”那晚的事了。但我在这儿要声明，那晚的宴席是设在天官府七号，而不是我的住所四号，但衡老的诗，我自己的诗，齐老先生的词，都说得仿佛是在我的家里，那是因为在席前席后都是在我的家里聚集的。唱秧歌，扭秧歌舞，也是

在我家里。我那个“家”说来也真是可怜，那只是一座被轰炸震得来快要颓圮了的一座破院落的三楼，楼上总共三间房间。但我这丝毫也并不是客气的“蜗居”，却从那时起，差不多成为了经常的民主集会的会场，有时竟有聚集到六七十个人的时候。七号要宽大得多，那是单独的一座三楼三底的院子，民主人士因为找不到地方开会，便都借用这个地点。有一个时期，除掉委员会的办公室之外，食堂、会客厅、图书室，都成为了半公开的会场；热闹的时候，一天竟有三四种座谈会在同时召开。在重庆，凡是和民主运动有关系的朋友，我相信，没有到过天官府的人，恐怕是没有一个的。

三十四年是民主运动公开化的一年。敌人的军事行动没有向贵州深入，重庆又得到一个苟安的局面，然而在军事与政治上丝毫也没有改善的倾向，民主运动的潮流终于爆发了。那一二两月间，接连着有各种政团及社团的宣言，差不多一致地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并组织联合政府。在民主同盟之外，工商界、妇女界、青年界、文化界，接二连三地都发表了宣言。但就我所知道的，此中恐怕以文化界所发表的一次宣言所起的反应最大。宣言是二月二十二日发表的，有三百七十二个人连名，其中包含了很多素来不过问政治的教授、学者、艺术家这似乎使当局发生了很大的惊异。在那宣言发表了之后，文化界的人好多受了影响。当局出动了好些大员四处进行反攻，开始是分化签名者，使自行登报声明否认，三百七十二人中有四个人这样做了，这当然不抵事。同时则进行威协，浙大教授费巩的失踪，就是在这签名之后不久的事。有好些人因此失了业。“罪大恶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终难幸逃罗网了。这个会在三月二十七日偕同国际人士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罗曼罗兰追悼会之后，于三十日夜便奉命解散了。开会是近因，而签名依然是主因。还有反签名运动，由另外一批“文化人”发表了拥护政府的另外一种“宣言”，起初的目的想争取三百七十二人中的多数的人重签，然而这目的却没有达到。这反对的“宣言”，签名的人实在很多，据说多不见经传，而且有改头换面地重复了的，真真是岌岌乎殆哉的一场恶战。这里有很多悲喜剧，可惜当时没有人把它纪录下来，不用说在今天已经有黄花之感了。

还须得申述的二月二十二日的文化界宣言，其实并没有敢用“宣言”两个字，而是客客气气模仿了工商界及其它的作风，用着“进言”两个字的。那“进言”在报上都发表过，今天看来当然算不得怎么一回事，然而在当时竟闹得天翻地覆。我们藉此也可以知道，时局终究也是有些进步了。这点进步当然是不知道费了多少的代价换来的。再须得我们提起的，费巩教授至今都还没有下落！究竟是死了呢？还是活着的呢？这应该是代价中的相当重要的一笔了。

黄齐老的词中所说到的“红岩”是中共办事处在重庆郊外所在地的地名。中共办事处在城内另外有一个地址，是上清寺五十号，这儿也就是周恩来先生的公馆。这个地方是中共招待文化界或新闻记者的地方。

同在上清寺，有鲜特生先生的公馆，名叫“特园”，民主人士也时常在这儿聚会。三十四年的下半年以来竟成为民主同盟的大本营。民盟主席张表方先生就是住在那儿的。“特园”很宽大，位于嘉陵江南岸，眺望甚佳。这儿后来由大家赠与了“民主之家”的徽号，是我写的字，还题了一首诗上去，诗我可记不得了。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可惜我们在重庆时没有把这儿所经过的一些事体尽量的纪录出来。

黄词中的“衡门”所指的是沈衡山先生所住的“良庄”，地在枣子岚垭，和“特园”比较接近。王炳南先生的家也在这儿的楼上，小规模的座谈会也每每在这儿召开。地方并不很大，但因为是衡老住的地方，差不多的人没有不知道的。

三十四年的六月，我到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的二百二十周年的庆祝大会去了。当时是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被解散后不久，情绪是相当悲愤的。有好些朋友认为我一定去不成，但我终于去成了，虽然在上飞机之前，还在九龙坡的飞机场受了两小时的留难。这一件事情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自由究竟有了怎样的限度。我离开了重庆之后，有好些朋友认为我是不会再回来了，也很希望我不要回来，但我终于在八月二十日又回到了重庆。这一年在世界上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动，纳粹德国被打垮，日本也投降了，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获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的民主运动不用说是受了很大的鼓励的。就是前一两年在纳粹德意志不可一世的时候，认为民主制度已经告终正寝了的人，现在倒真有点如丧考妣，暂时之间颓然自失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德国会打败而苏联会打胜？怎么英美竟和苏联联合了起来？苏联也是民主国吗？不管怎样茫然，而事实总归是事实，希望在新疆和德国军事顾问重新握手的将军永远失望了。（德国军事顾问从中国撤退时，某将军在飞机场送别，言在新疆再见。）然而最惊人的一件事体发生在重庆，在九月初头当时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亲自去延安把毛泽东先生迎接了出来。这差不多等于是个奇迹！毛泽东！毛泽东！响澈了山城，也响澈了全中国，全世界。经过了四十几天的周旋，终于在国庆日有“双十国共会谈纪要”发表，召开党派会议并改组联合政府的拟议，在半年前还是犯罪的言论，而终于经过政府代表的签字而公布了。这是成为了今年三十五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张本的。

时局的发展真有惊人的迅速。由事后今年一年间的过来证明，这发展的前途并不容许人乐观，但在当时，廉价的乐观倒也是谁也没有抱着的。就在“双十纪要”发表的前两天，都还出过一件惊动山城的凶事。

那是十月八日的晚上，中共办事处的秘书李少石先生以汽车由城送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归途在汽车中被人枪杀，当晚在天官府附近的市民医院毙命。这真把全民主人士乃至全山城的人都惊愕了，而在我是尤其出自意外的。少石先生英文很好，且长于诗词，是廖仲恺先生的女婿，为革命受过很久的牢狱之苦，而今天又受了和仲恺先生同样的遭遇。他所乘的汽车而且是我的车子，这当然更不能不使我无介于怀了。

事件后经证明是司机误伤了路旁休息的士兵，未及停车而遭了士兵的枪击。司机是逃跑了，至今还不知道详细的情形究竟是怎样。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谁都以为有很大的阴谋。在事体证明以后，有好些人也还是不大相信。就在这不大相信的一点也就可以证明大家在当时所抱的观感是怎样了。对于时局，谁都是没有盲目的乐观的，然而谁也没有盲目的悲观。乐观的前途明明摆在目前，只是山路崎岖，羊肠宛转，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曲折迂回，然后才能达到目的。

（十二月二十日）

（原载《新文化》半月刊三卷一、二期，一九四七、一、十四）

“理未易明”么？

胡 绳

胡适之向他的学生说：“理未易明，善未易察。”

回想“五四”当年，胡适之和他的朋友喊出自话文学，文学革命的口号，那时何等虎虎有生气。在那时，胡适之一定以为“理”是已经明明白白的了，自话文学一定代旧的文学而兴起，“善”也是显然可察的了，属于过去时代的一切旧文学、旧道德决不是善的。

不到二十年，胡适之已经觉得理不易明，善不易察了。

我说，其实不仅是“理未易明，善未易察”，而且对于那不站在人民大众的进步的立场上，简直是不可能“明理，‘察善’”。

举目前正为大家所最关心的问题来说吧。

首先说国民大会及其宪法。背离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议，片面地召开了国民大会，参加的人除了自己的喽罗而外，只有一些甘愿来当捧场者的人。一面开着会，一面打着仗。在会里经过吵吵嚷嚷，写成了一部宪法，形式上借用一些政协决议的宪草修改原则中的词句，内容上却还是五五宪草的实质。

在这一件事中要明其理察其善是难是易呢？

道理很明白：这样的国民大会决不能代表全国人民，这样的国民大会开过后，并不能对国内的局势有任何的改善；由这国民大会产生的宪法没有任何价值，决不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化，恰恰只足以使分裂加深，为中国的民主道路的障碍。因此，不承认这宪法，取消这个宪法，那是最善不过的了。

但这样的道理一定不是荣任国大主席，亲手由国府主席接受宪草的胡适之先生所愿承认的。听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不承认宪法的呼声，也许他又要摇头说：“真的是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啊”！

再说美军驻华问题。美军的继续驻华是有理还是无理呢？事事依靠美国，不顾国权民脉，是有理还是无理呢？要求美军撤退是善还是恶呢？挽留美军继续留华是善还是恶呢？——这些问题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已经清清楚楚了。

这一切事实还不够明显么？在“接收”时期，美军在华是如何慎密地为开辟内战战场而布置，在一年来的内战过程中，美国是如何积极地帮助军火物资以加强反人民的内战，又如何巧妙地用调停和暂时休战的办法来解除反人民集团的困难；中美商约的内容是如何凶恶，比日本在民国四年所提二十一条件更加厉害，在华美军是抱着如何的帝国主义心理对待中国人民，抢劫，殴打，甚至强奸。看了这一切事实，中国人民已经认清了美国在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也认清了挽留美军在华的卖国媚外心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北大的女同学沈崇被美军侮辱的事件才激起了全国青年，全国人民的无比的愤慨，一致喊出了“要求美军撤退”的口号。——这是最崇高的爱国心的表现。爱国是善，卖国是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的国格，这是真理，一切诡辩和曲解都是见不得人的伪理。